



当地农民在打理梯田

红河哈尼梯田 迎来“后申遗时代”

开着一家农家乐的大鱼塘村村民李正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他的农家乐去年毛利润在7到8万元，相对以往种田几千元的年收入，确实不可同日而语。

类似李正福这样的例子在申遗成功后，因游客对食宿的需求增大，会只多不少。在旅游收益见效快和种田收入低的差距之下，“当地老百姓是否还会继续种田”？

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菲律宾伊富高梯田就曾因梯田面积缩减等原因，在2001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。

针对这个担心，当地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和老百姓请大家“放心”。“田地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不能荒废，这是我们的传统。”

□资讯

豫剧《清风亭上》亮相国家大剧院

国家十大精品剧目之一——由中国河南豫剧院二团演出的大型古装豫剧《清风亭上》于6月19日、20日在国家大剧院倾情上演，豫剧名家、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树建和著名马派艺术传人柏青领衔主演，以弘扬“孝道”为主题，讲述了张元秀夫妇在清风亭上捡得弃婴张继保，含辛茹苦抚养13年，张继保却贪图富贵，得中状元后不认养育恩情，将养父母气死在清风亭上，张继保最终遭雷劈。

《清风亭上》在古典豫剧《清风亭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，故事更加精炼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，增加了对逆子张继保心理转变的刻画，使这一人物更加丰满。舞美、灯光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进，舞台风格清新简洁，增加追光效果突出人物情感；表达形式更具现代气息，多白少唱，放弃大量使用方言，语言更近普通话。（赵天宇）

梅墨生画诗巡展广东行

中国著名书画家梅墨生7月3日至14日将于广东美术馆举行“从道中道——梅墨生画诗巡展广东行”。本次展览将向观众呈现梅墨生近年来的潜心之作近300余幅，有山水作品82幅、花鸟作品78幅、写生作品107幅、书法作品83幅，其中收集梅墨生近年诗稿小楷30余帖，皆为画诗精品。

“诗书画”的结合是中国艺术的传统表达方式，梅墨生坚守中国画传统和中国文化内涵，以诗书画并进的修为，实现对中国艺术品质和民族气质的追求，这是他在现代文化形态下对传统文人画的回溯和礼赞。本次展览为广东美术馆重点学术研究项目，已列入广东美术馆《现当代艺术家丛书》。据展览方介绍，本次展览结束后还将继续在上海、陕西、北京、山东等地的省市美术馆及国家美术馆举行巡展活动，巡展计划每年举行两次。（俊德堂）

低碳公益影像展开幕

日前，以“为了梦想的家园”为主题，由中国新闻社、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第四届“低碳发展·绿色生活”公益影像展暨“中国低碳榜样”发布在京举行，会上还揭晓了首个“全国低碳日”的标识和年度口号。

低碳影像展向公众介绍了低碳经济、绿色发展的理念与知识，反映了中国政府和各界做出的巨大努力，以及百姓身边的低碳生活故事，对提高公众低碳发展、绿色生活的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（王 姗）

神如

笑称自己是“吃着哈尼梯田里的稻米长大”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局长张红榛，小时候并不觉得梯田宝贵，“回头看才明白，如果没有梯田，不仅没有红米吃，没有围绕梯田耕种的各种节日，而且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会增多。”

她朴实的表达背后正是日前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——森林、水系、梯田和村寨“四素同构”的农业生态系统。

如今，这绵延千余年的“活态文化景观”吸引了世界的目光。“这是云南的哈尼梯田，是中国的哈尼梯田，也是世界的哈尼梯田！”云南省副省长高峰的这番话不仅传递了保护的决心，也传递了红河哈尼梯田的“世遗”之路刚刚开始。

红河哈尼梯田的“世界梦”

“踏上哈尼梯田……”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大鱼塘村村民卢文学的手机响了，长街宴之歌飘了出来。这位现年60岁的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，在大鱼塘村地位很高，因为村里的祭祀活动、节庆活动都由他主持，他还收了5

个徒弟。

在申遗过程中，各方的重视让卢文学觉得当地的“服饰文化、农耕文化、祭祀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保护”。他也告诉自己：“祖先留下来的，不能在我们的手中失传。”

卢文学的心愿并非个性化的想法，“实施红河哈尼梯田整体保护”是当地政府一直所强调的。“将红河哈尼梯田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纳入保护范围，确保了文物和习俗、景观与生态的整体保护。”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谭萍说。

申遗成功后，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保护进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视野，对保护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，确保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也是关键所在。红河州政府日前承诺，履行《世界遗产公约》，依据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管理条例》和《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总体规划》保护好哈尼梯田。

“不能荒废祖宗传下的田地”

因为是在壮阔大山环境中开创、覆盖雄伟山体而形成，哈尼梯田被誉为“伟大的大地雕刻”。在人们惊叹于这古老东方的稻作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魅力

时，却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——作为巨大的活态在用遗产，红河哈尼梯田的保护和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。

“既然是活态的一定会变化，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，因此保护难度很大。”云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余剑明说。

开着一家农家乐的大鱼塘村村民李正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他的农家乐去年毛利润在7到8万元，相对以往种田几千元的年收入，确实不可同日而语。

类似李正福这样的例子在申遗成功后，因游客对食宿的需求增大，会只多不少，在旅游收益见效快和种田收入低的差距之下，“当地老百姓是否还会继续种田”？

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菲律宾伊富高梯田就曾因梯田面积缩减等原因，在2001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单。

针对这个担心，当地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和老百姓请大家“放心”。“田地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不能荒废，这是我们的传统。”大鱼塘村几位村民说。

为了避免没人种田的情况出现，政府也在努力，“把农林水补贴打包发给老百姓，民居修缮政府也补贴一部分，州、县政府对农民的种粮补贴也要积极推进。”谭萍说。

如何应对游客增多压力

申遗成功，游客会增多是不争事实。云南省元阳县县委书记姜仁斌介绍说，按保守估计，来当地旅游的年游客量在未来几年，将达到150万人次，但据专家的测算，“申遗成功后，游客会增加3倍。”

面对大批涌进的游客，如何平衡保护和发展？姜仁斌认为关键在于坚持“保护为主，利用为辅”的原则。其实，在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前，已有旅游开发的行动——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“准遗产地”，对其进行整体旅游规划开发。“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管共赢，而且开发行为必须在省、州、县的监管下进行。”姜仁斌说。

但企业的逐利性会不会影响遗产保护，仍是关心红河哈尼梯田者心中的疑问。“我最关心的是遗产区搞旅游之后肤浅开发和过度开发。”长期跟踪哈尼梯田申遗项目的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提醒，梯田旅游必须保证其收益惠及梯田文化的创建者，而不仅是参与投资的公司与企业家。对此，姜仁斌表示，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制度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。“这些年相应保护管理条例已陆续颁布，要实施依法保护和科学指导。”

□观察
本报记者 赵晓霞 文/图

□对话

聂 聆

“是时候寻找中国当代艺术的多样性”

6月是当代艺术的狂欢节。意大利，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中国艺术家以“扎堆”的模式光临了以当代艺术为主的这场最富盛名的饕餮宴。而在中国，最知名的当代艺术大奖之一——“HUGO BOSS 大奖”首度在亚洲推出全新的艺术大奖，并且第一次将目光聚焦在中国。

“HUGO BOSS 大奖”向来以评委的完全自主权而著称。作为亚洲艺术大奖的联合主办方，上海外滩美术馆将负责以后每两年一届的评选，每届奖项将根据亚洲的转变与话题持续，变更其所关注的领域并逐年深入。

“亚洲的社会、经济与文化的激烈变革，产生了对当代艺术的不断重构的要求，中国在此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。”此次艺术大奖评委会主席、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拉瑞斯·弗洛乔解释首届亚洲艺术大奖为何聚焦中国艺术家。

据介绍，在此次亚洲艺术大奖的名单中，有7位来自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出生、生活并工作的新锐艺术家获得提名。上海外滩美术馆随后将举办他们的群展，展览过程中将选出并公布一位最终获奖者。

“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迅速，我去香港看过，水平很高，和纽约、巴黎等欧美城市并没有太大差别。”拉瑞斯说。他认为，历史上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多误解。

他们以为中国艺术就是传统的刺绣书画和价格昂贵的高度仿制技术，他们甚至不认为中国有当代艺术。

是时候改变这种误解了。拉瑞斯说：“现在是后全球化时代，已经不是东方和西方这种均质化的二元对立时代，中国当代艺术是时候寻找自己多样性的方式，而不是依托传统的中国艺术的定义，应该进行更多当代的、实际的艺术实践。”

雕塑、影像、装置、综合媒材，对于当代艺术是造型艺术还是观念艺术，至今仍存在争议，拉瑞斯认为，相比创作的媒介来说，角度更重要，他更看重艺术表现形式能否给观众带来情感共鸣，能否联系过去、未来和现在。

此次入围名单中，来自两岸三地当代艺术家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质，拉瑞斯说“很有意思”，香港、台湾艺术家和大陆艺术家很不一样，可以看到他们在寻求身份的挣扎，他们的作品有很多细节，很多历史问题的叠加与演进在他们那里得到了重新构建。

□聚焦

本报记者 郑娜

我也没想到会这么火



大黄鸭何以如此受宠

2007年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起航，大黄鸭已经游历了11个国家共13个城市。今年5月，大黄鸭在维多利亚港亮相后，掀起了全港乃至全中国的“追鸭风潮”，维多利亚港商场的日均客流量比平时翻了一番，有许多人从内地专程赶去看望这只巨鸭，一个多月时间共吸引了800万市民及游客。

很多人不明白大黄鸭为什么会这么火，连霍夫曼也一样：“我也没想到大黄鸭在香港会这么火，看到大家跑到香港围观它，我还以为是一场大型演唱会呢。”

大黄鸭的原型是浴缸里的橡皮黄鸭，属于西方人的童年记忆，而在中国，大多数人并不熟悉它，何以如此受宠？在霍夫曼看来，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：一是身处快节奏时代的人们，渴求简单、快乐；二是近年来中国流行的“萌文化”，喜欢“卡哇伊”的事物。由于大家太喜欢大黄鸭，中国内地许多城市出现了山寨品，霍夫曼很无奈。此次北京之行，他也将与设计周组委会就版权保护进行商讨，制定一系列版权保护措施。

在北京选址会是个惊喜

第一次来北京，霍夫曼觉得很新鲜。和“大黄鸭”去过的其他城市不同，北京



霍夫曼第一次来到北京

没有临海的宽阔水域，为这个可爱的大家伙找个合适的住处成为一个不小的难题。据了解，大黄鸭的展览地点可能会设在城市中心，方便游客前去观看。包括北海、后海、玉渊潭、颐和园、奥林匹克公园等地都被列为备选，不过霍夫曼尚未确定最终地点，但他确保到时候会是“一个大大的惊喜”。

至于北京版的大黄鸭会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霍夫曼说，这次会在尺寸上有所变化，此前香港展出的大黄鸭高16.5米，而在北京展出的大黄鸭预计高10米左右，具体尺寸还要结合水域面积、风力、漂浮稳定性、观看视角等综合环境因素。其他方面跟前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

大黄鸭会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效应，霍夫曼也颇为期待，他也想知道大黄鸭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，对北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。有人把大黄鸭评为2013年上半年最引人关注的公共文化事件之一，霍夫曼乐见其成：“你们不觉得成为公共事件本身就是艺术吗？”